

给朱德当过警卫员,曾任“英雄的王海大队”政委,徐树年心中有着不一样的家国情怀——

百岁老兵讲述三个心愿

本报记者 梁亮 宁夏日报研修记者 姜璐 通讯员 黄梦婷

对着镜子,扣上风纪扣,拉直衣袖,整好衣角……刚过了百岁生日不久的徐树年,一穿上绿军装,顿时仿佛年轻了好几十岁。

白发苍苍的徐老说起话来,依然思路清晰、中气十足。他的一言一行之中,无不显现出一位军人的干练果敢。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到抗美援朝战争二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这位战功赫赫的百岁老人,心中对祖国自然有着不一样的深厚情感。

“我对自己的生活已经没什么所求。”徐老告诉记者,他现在所有的心愿都和这片让他深爱的土地有关。

“优良的革命传统,应该永远传承下去”

走进徐老的家,面积不大,布置简单,卧室里的桌椅、床铺、衣柜,都看得出斑驳的痕迹。大女儿徐访苏多次想把旧家具换掉,但都被父亲以“修修还能用”为由婉拒了。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朱老总曾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部队与人民同甘共苦。”几十年来,虽然岗位不断发生变化,但徐树年在生活上一直很节俭,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朱老总从不搞半点特殊,他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不愿意换新的。”入党84年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一件小事,有战士看到总司令的衣服实在太破,悄悄给换了一件新的,却被朱德严厉批评:“一件衣服可以穿9年,现在才穿了几年怎么能换呢?”

“我虽然离休了,但政治思想没有离休”,这些年来,徐树年依然时刻鞭策自己。在他的笔记本里,写着这样一段话:“即便坐名车,住洋房,吃山珍海味,又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海中月亮,一切都是空的……”

不仅如此,徐老还曾担任5所学校的辅导员,为青少年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和优良传统,为传播红色星火继续发光发热。

第九千休所门诊部主任傅世堂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徐树年计划给学生作报告,但当时他感冒未愈,身体状况不佳,傅世堂就建议他暂缓外出。“孩子们能抽出时间不容易,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耽误大家的事。”最后,徐树年坚持完成了两个小时的报告。

现在身体不如从前,无法外出讲课,但令徐老最开心的事,就是接待前来学习的小朋友们。



徐树年(中)给青少年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和优良传统。



迎来百岁生日的徐树年



与战斗英雄王海(右)的合影(资料照片)

“我要把一切都献给党和国家”

早在8年前,徐树年就瞒着家人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那天是7月1日。

“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我的,我自然也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国家。”徐老对此很坦然,既不引以为傲,也从后不后悔。

这一决定,徐树年的家人和亲朋并不觉得意外,因为他平时教育晚辈说得最多的,也是“感恩”。大女儿徐访苏说:“父亲总是会感叹,说他得到了很多,奉献却还远远不够。”

1938年,徐树年加入八路军。因为年纪小、头脑灵活、行动敏捷,他成为了通讯员。从老家河北蠡县行至山西灵邱县时,与日军狭路相逢,徐树年在战场上冒死穿线,传递各种指令。“战况非常激

烈,看着一个个战友倒在眼前,我却来不及多看一眼,必须含泪往前跑。”徐老哽咽道,“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才换来了胜利。”

在今年的百岁生日会上,徐树年又一次向党深情告白:“没有共产党培养教育亲切的关怀,就没有我徐树年的今天。”

参军前,徐树年只断断续续上了两年小学,“连手表都看不懂”。虽然在战场上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但是文化知识方面依然是他的短板。

1942年,经过层层选拔,满足“忠诚老实,政治坚定,灵活机动,接受过作战考验”四点要求的徐树年成为了朱德的警卫员。

“有一次,朱总司令把我问住了。”回

忆起那天,徐老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徐树年刚到朱德身边工作不久,朱德在了解他个人情况时得知徐树年是河北人,便随口问道,“小鬼,你既然是河北人,那么我来问你,这个地方为啥叫河北省呢?”

“你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是智慧的钥匙,学习就好比人身上的血液要流动一样,不能停,只有经常学习,才能懂得为何革命,怎么样革命。”朱德的一席话深深地印在了徐树年的心中。

1950年,徐树年成为志愿军空三师九团飞行一大队政委,而这支队伍正是创下击落击伤29架敌机的赫赫战绩的“英雄的王海大队”,一举打破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产生了王海、孙生禄、禄景文等一批战斗英雄。

抗美援朝时参与国际救援的红十字救护人员陈敏书遗物被捐赠给省红十字会——

6本日记,揭开一段尘封往事

本报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李伊平

最近,省红十字会收到一份特殊的捐赠,捐赠人是省红十字会第一届常务理事陈敏书的家人,捐赠物为6本日记、3本相册以及大量勋章等。这些物品,也是70多年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战斗与生活的见证。

1951年6月,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疗队五大队大队长的陈敏书,带领30多位医护人员踏上朝鲜

战场。在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他们救治伤员,服务朝鲜人民,做了大量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段历史也变得鲜为人知。

6本日记,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往事,循着这些文字,记者找到了几位仍健在的陈敏书同事,在他们的讲述中,这位新中国最早参与国际救援的红十字救护人员的形象,渐渐变得生动和立体。

“我们将不怕一切困难,不怕敌人炮火的威胁”

——摘自陈敏书1951年6月19日的日记

今年2月,陈敏书的子女对他的房间进行整理时,在墙角的一个皮箱里发现了厚厚6本日记、3本相册和一堆军功章。这些日记的内容,是陈敏书从未向家人说起的。“1987年2月父亲去世后,他的房间从来没人动过,现在我们自己也渐渐变老,就想着在他去世35周年之际,对他的遗物进行整理。”陈敏书的儿媳胡力宁告诉记者。

陈敏书1918年出生于广东普宁,1938年8月到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5月,他担任浙江省立杭州医院(现浙江省中医院)军代表。1951年6月至1952年8月份,陈敏书任赴朝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疗队五大队大队长,1953年再赴朝鲜,以朝中谈判代表团红十字小组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释俘观察代表等身份,出席了在板门店举行的谈判。

“父亲一生有着丰富经历,但他总是说,在朝鲜的那几年,是他最难忘的岁月。”陈敏书的女儿陈幼民说,这6本日记,记录的正是他在朝鲜的经历和感受,也让他们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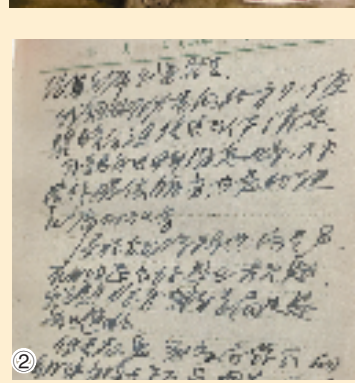
1951年6月20日上午,由杭州各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疗队第五大队(以下简称“医疗队”),在陈敏书的带领下,离开杭州远赴朝鲜战场。此前一天,陈敏书写下了此次远征的第一篇日记:

“在整装待发的几天中,我们得到全市人民热烈爱戴和支援,为了答谢各界人民的热望,我们提出保证:我们将不怕一切困难,不怕敌人炮火的威胁,誓与志愿军伤员伤病员同患难、共安危,爱护他们胜于自己,为了彻底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我们愿贡献一切力量,甚至生命……”

当年7月12日,医疗队抵达朝鲜前线。陈敏书在日记中第一次记载的战场经历,是1951年7月18日,在阳德医疗手术队驻地进行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感动。

“这几天夜里敌机来得很勤,而且飞得很低,在我们的上方盘旋。为了防空,我们走了4个小山头去伤员处。其中一个伤员,他的腿已骨折,但他的战斗意识很顽强,不愿意回国去,他记着兵团首长的话,‘不要给我们的兵团掉链,要勇敢地打击美帝’。我宽慰了他一阵,另外一位姓陈的战士是在打坦克时被坦克上的机枪打伤了腹部,但他的精神非常好……”

医疗队初抵朝鲜时,第五次战役已近尾声,驻地附近伤病员滞留较多。为了不延误抢救,医疗队到达目的地后,就立刻走进一座战火中幸存的朝鲜老乡民房充权的临时手术室,在极其简陋、闷热的条件下,投入到抢救伤病员的紧张战斗,通宵达旦连续奋战了25天。



①在朝鲜工作的陈敏书(资料照片)
②陈敏书写的日记
③家人捐出的陈敏书遗物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如果说是谁给我们力量,我想正是这些最可爱的人”

——摘自陈敏书1952年7月29日的日记

“父亲生前总是说,是朝鲜的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这次看了他的日记,我开始明白了。”陈幼民对记者说。

在日记中,陈敏书详细记录了医疗队每一位医疗队员的工作,记者辗转找到了两位还健在的医护人员,从浙大二院退休的吴德桢和杭州医学院退休的王雪蕉。对于当年的这位老队长,他们都有着很深的印象。

“由于天上都是飞机,我们的医院,很快从老乡家里搬到了山洞。之后的日子,我们工作和吃住都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吴德桢说,最多时,陈队长一天要负责60余台手术。

据不完全统计,到朝鲜10个月,手术大队就完成了2000多人次手术。“我们还经常主动

为伤员献血。从陈队长到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没有丝毫犹豫。陈队长总是和我们说,战士们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献点血算得了什么。”王雪蕉回忆说,有一次,在陈敏书的带领下,她和队友徐道安等集体献血1000余升,挽救了伤员苏元祥的生命。

翻开陈敏书的日记,记者也多次看到他对志愿军战士的敬意。比如,1952年7月29日,他就这样写道:“如果说是谁给我们力量,我想正是这些最可爱的人。”那一天,陈敏书带领医疗队员们,完成多台手术。“后来我们在学习、工作中遇到困难,父亲总是和我们说,想一想当年在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我们这一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呢?”陈幼民回忆。

“和平应该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摘自陈敏书1952年11月15日的日记

作为一支红十字救援队,除了救治受伤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也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战俘,为那些失去抵抗力的战俘服务。通过陈敏书的日记,记者看到,医疗队不仅注重战俘营环境卫生和传染病的防治,供给战俘丰富的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还帮助和教育战俘搞好个人卫生。

1951年12月25日上午,陈敏书到中国红十字会汇报了在朝鲜医疗手术队工作情况。第二天,中国红十字会派人找到陈敏书,希望他代表中国红十字会调查战俘营,及在协议签订后处置战俘工作。

就这样,之后在朝鲜的日子,陈敏书将大量工作花在战俘营的服务和保障上,他的日记,也详细记录了战俘们的生活情况。“冬天每人发一床毛毡,一件大衣,棉服,棉手套,棉帽。夏天发单衣两套,单鞋以及参加各种运动用的衣服。”

除了给战俘生活上保障,陈敏书在日记中,还详细记录了各项文体活动。“一向重视战俘的体育文化生活,举行各种活动,如球赛,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举行了运动大会一次,各营举行21次,鼓励体育运动。”

1952年11月15日至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处选拔出500名优秀运动员,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别开生面的“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次特殊的“奥运会”,也与之之前多次举办的战俘运动会打下的基础有关。当时陈敏书在国内,听到消息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象运动场上欢乐的场景,我感慨万分,和平应该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在朝鲜工作期间,陈敏书因工作积极、成绩显著,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而在朝鲜的工作,让他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更多的感悟。

“父亲总是和我们说,用一颗真心待人,敌人也会变成朋友。”陈幼民说,父亲和医疗队员们的服务感动了不少战俘,改革开放后,父亲还和一些战俘通信,一封封信件,也像一条条友谊的小船,而父亲的真诚和善良,一直影响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